

DOI: 10.13317/j.cnki.jdskb.2026.32

[历史学研究]

倭患、冷战与数字封锁：东西方贸易危机中许可证治理的五百年演进与比较

王谈谈, 葛继勇

摘要:全球贸易史是危机与治理的互动史,当贸易活动陷入危机时,许可证制度往往成为国家介入市场的核心工具。考察16世纪明代应对倭患与贸易失序的信票制度、20世纪冷战时期巴黎统筹委员会(COCOM)技术禁运许可证、当代美国芯片出口管制三大典型案例可知,跨越五百年的贸易许可证蕴含着“危机应对—权力投射—效能博弈”的内在核心逻辑。明代信票开创“凭证交易+限期回销”范式,COCOM将许可证转化为意识形态对抗工具,数字时代许可证则以技术手段嵌入全球产业链。通过比较三者,不仅能展现国家治理能力的历史演进,也能剖析主权威信与市场自主、技术控制与反制创新等深层矛盾,为当前全球贸易摩擦中的制度选择提供历史镜鉴。

关键词:许可证治理;信票制度;COCOM;芯片出口管制;制度韧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8AZD030)

作者简介:王谈谈,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从事明代中日关系史、古代东亚关系史研究;葛继勇,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从事日本文化、古代东亚文化交流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26)03-0116-09

一、危机史观下的贸易许可证治理比较框架

在全球贸易发展的漫长历程中,许可证制度始终是国家应对危机的重要治理工具,其演变轨迹深刻反映了权力、技术与秩序的复杂互动。然而,既有研究多将各历史时期的许可证制度视为孤立的应对机制,未能充分揭示“危机—权力—技术”三者如何共同塑造贸易治理的演进逻辑。为此,本文以危机驱动为理论透镜,跨越五个世纪(1547—2025年)考察了三种典型样本:明朝嘉靖年间应对双屿倭患的“信票制度”,冷战时期西方阵营对华技术封锁的“COCOM许可证体系”^①,以及当代美国遏制科技竞争的芯片出口管制。这种长时段、多案例的比较研究,旨在突破传统制度史研究的时

^① 巴黎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to Communist Countries,简称巴统组织或COCOM),该机构正式定名为“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1950年由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六国作为创始国设立,总部设在巴黎的美国驻法国大使馆内。除了上述国家外,巴统组织的正式成员国还有以下国家:卢森堡、挪威、丹麦、加拿大、联邦德国(1950年加入)、葡萄牙、日本(1952年加入)、希腊、土耳其(1953年加入)、西班牙(1985年加入)、澳大利亚(1989年加入)。参见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6—147页。

空藩篱,揭示国家认证能力在危机治理中的演变逻辑与结构性矛盾。

既有研究往往陷入两种理论窠臼。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东方中心论”虽然强调了前现代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主导地位,却忽视了非西方社会的制度创新力^①。欧洲中心叙事则将现代许可证制度溯源至葡萄牙的“船牌制”(1554年),而对明代中国的同类实践视而不见^②。近年来国际贸易博弈的研究热点是各国所制定的不同许可证政策及其对技术跨国流动与产业布局的影响。研究表明,该策略不仅影响技术扩散效率,还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尤其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设立许可证制度成为各国争夺技术优势的关键手段^③。本文试图超越传统东西方的简单二元对立,将明朝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宁波的信票运作、冷战时期对中国的贸易禁运与当代美国的芯片出口管制进行串联分析,关注贸易许可证制度从明代到当代的演变路径,揭示制度演进中技术赋能与地缘博弈的深层互动。

理论框架上,本文创造性地构建了“制度韧性动态模型”这一动态比较范式,通过“危机性质—认证技术—治理效能”三维锚点打通跨时期比较壁垒。三者虽分属前现代“行政凭证管控”(信票)、现代“多边清单管制”(COCOM)与后现代“算法霸权治理”(芯片管制),但均以“国家认证能力应对贸易危机”为核心逻辑。信票对应朝贡失序,COCOM对应阵营对抗,芯片管制对应科技霸权,因此它们具备跨时空对话的基础。该框架核心机制包括三个层面:危机性质决定制度设计逻辑,认证技术塑造管控精度,治理效能与反制创新构成动态反馈循环。

上述三个案例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揭示了贸易许可证治理中隐含的矛盾,即主权威信与市场自主的对抗(如信票试图以公文权威替代商人互信),技术控制与制度滞后的错位(COCOM分类手册难以及时覆盖新兴技术),以及压制效能与反制创新的悖论(芯片管制意外催生中国RISC-V生态^④)。当前中美科技脱钩背景下,重新审视明嘉靖朝为应对倭患压力及因应日本遣明使而发明信票的历史过程,或能为中国构建“制度型开放”新范式提供珍贵史鉴。

二、倭患与信票:朝贡体制的危机调适(1547—1550)

明朝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夏天,日本遣明使策彦周良的船队驶抵宁波港时,明东南沿海正深陷贸易失序与地缘安全的双重危机漩涡。浙江奸商长期欺诈日本使节的行径已呈制度化腐败态势,掌管浙江军政大权的朱纨在《鹭余杂集》中痛陈“夷人随带货物,有等奸人,指以交易为由,诬骗推延……官司苟且避事,佯为不知,其实不能禁遏”^⑤,揭示了地方官府监管的全面失灵。与此同时,盘踞双屿港的李光头、许栋走私集

① FRANK A G.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M].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116-117.

② SUBRAHMANYAM S. The Portuguese empire in Asia, 1500-1700[M].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Press, 2012:82.

③ 邵科.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博弈的深层话语构造:中国范式和中国路径[J].法学研究,2021(6):149-169.

④ RISC-V是一种开源免费、精简模块化CPU指令集架构(ISA),是芯片底层标准,打破x86/ARM垄断。参见倪光南《为RISC-V生态建设贡献中国方案》,载《中国网信》2023年第4期,第39-42页。

⑤ 朱纨.鹭余杂集[M]//沈乃文.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44册.合肥:黄山书社,2015:385-386.

团已形成跨国武装贩私网络,《筹海图编》直指其“引倭聚双屿港为巢……出没诸番,分踪剽掠,而海上始多事矣”^①。在策彦周良的使团登陆宁波一年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五月十四日这天,朱纨带着通事卢锦等人,亲自到嘉宾馆审问策彦周良等人。策彦周良等答复:“占据双屿港事,进贡使臣非所敢知,想大邦海寇之所诱。近年大邦众人来日本者,不知其几多。大邦亦何从知之等语。”^②朱纨等人一直担心日本使节是否与双屿的盘踞势力有所勾结。

值此危局,朱纨创造性地移植广东“验货给照”经验,于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十九日颁行信票制度^③,其相关核心文献《浙江省舶提举司为夷情事》载于《嘉靖公牍集》第20号文书^④,是破解信票运作机制的关键史料。笔者依据搜集的现藏于日本高月观音之乡历史民俗资料馆的抄本资料,并结合大庭修整理的文本,再次校订第20号文书,摘录如下:

浙江省舶提举司为夷情事:抄蒙浙江等处提刑按察司、带管巡视海道兼理边储副使魏纸牌。案照:先蒙钦差巡抚浙江兼管福、兴、建宁、漳、泉等处海道地方提督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案验,照得:夷人求贡,志在得利^⑤。随带货货,当有归着。该道即立印信照票,挨编号簿一样二扇。一付嘉宾馆,一留该道。明许大小商人赴道报名,给领信票,定与限期,赴馆两平交易。既毕,依限赴道回销,过限提究。无票者即系违禁通番,许官兵保甲拿送该道,问招详夺等因。抄行到道,奉经备行宁波府,转行提举司遵照及给示晓谕。去后,今照置簿印票已完,合行发付。为此,除文簿发来外,牌仰本司官吏,照牌事理,即便率同通事卢锦等,将前项文簿交与夷使周良等收候,明白示谕。凡有买卖商人,如贖有本道照票者,务比字号相同。将所买所卖、货物价值、商人牙保姓名填入簿内,两平交易。既毕,赴道回销,不许违期及容人诬賒。中间如有无票商人,或一票挟带数商,就便送道究治。该司务须时加稽察,毋容通事并在馆夫役通同诱引作弊。访出,定行从重究治不贷。仍取各夷领簿文状缴查。事完,将簿缴报,俱毋违错,不便等因。蒙此,拟合通行。为此除外,牌行夷使周良等,照依牌案事理,即将前项发来文簿收候。凡有买卖商人,如贖有本道照票者,务比字号相同。将所买所卖、货物价值、商人牙保姓名填入簿内,两平交易。既毕,送司查对稽察,以凭转送本道。不许违期及容人诬賒。中间如有无票商人,或一票挟带数商,就便送道究治。毋容通事并在馆夫役通同诱引作弊,致生悔吝。先具夷使等领簿文状一样二本缴司,以凭转缴施行。仍候事毕,将簿缴报,毋得违错。不便,须至牌者。

计发去号簿一扇,共计一百二十六叶

右牌行夷使周良等,准此
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十九日给
定限本月次日缴

① 郑若曾,李致忠.筹海图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7:322.

② 朱纨.璧余杂集[M]//沈乃文.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44册.合肥:黄山书社,2015:393.

③ 牧田諦亮.策彦入明記の研究:上[M].京都:法蔵館,1955:226.

④ 大庭脩.芳洲文庫の「嘉靖公牍集」について[J].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1977(1):1-22.

⑤ 冒号为文书中常用的断句标点,表示“引用”或“内容如下”等。本文文献摘录遵照此格式,不再另起一行。

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十九日,当浙江省舶提举司官员将一册带有字号标识的号簿送至宁波嘉宾馆时,策彦周良或许未曾料到,这份 126 页的簿册将会成为破解明朝贸易危机治理的关键。信票制度的运作始于权力中枢的精密设计,巡抚朱纨以广东“验货给照”经验为蓝本,授权海道副使魏一恭(嘉靖二十七年坐镇宁波的福建籍进士)全权执行。其核心逻辑是构建三层管控体系:商人需实名至海道衙门报名,领取印有“单汉字+序号”(如“仁字三十五号”)的信票;日本使节则持配套号簿,在交易时同步登记货物价值、牙行信息;最关键的闭环监管体现在回销环节,商人须限期携信票直返海道衙门核销(而非经市舶司转递),使困则通过市舶司上缴号簿供海道比对双簿。

这一过程凸显了制度上的创新,勘合需填写长度接近 1 米的国王咨文,而信票则是较小的便携凭证。文引制度实施四十年后,循环号簿才于月港落地施行^{①②},但信票早已实现“交易留痕—双向稽核”机制。更值得深究的是权力重构——市舶提举司沦为文书传递者,宁波府只能被动转呈公文,海道衙门却通过掌控信票发放、号簿稽核及违规裁量权,成为事实上的贸易中枢。这种海防体系兼有贸易管理的模式,恰是嘉靖朝应对倭患的无奈创变。

然而其依赖于“人治”的结构性缺陷,注定了信票制度不过是昙花一现。随着策彦周良一行归国,朱纨因严打走私触动闽浙豪强利益,遭御史弹劾“擅杀”,愤而服毒自尽。明朝与日本之间正式的朝贡关系彻底落幕,信票如无根浮萍随朝贡体制的瓦解而消亡。耐人寻味的是,该制度在空间上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16 世纪 70 年代,葡萄牙人在澳门推行船牌制,要求商船领取许可证方可贸易,其“字号登记+限期回销”机制与信票高度相似,但暗藏本质差异。信票是朝贡体系下“防走私、稳秩序”的危机调适,船牌制则是早期殖民霸权“控航线、掠资源”的工具,二者分别构成了 16 世纪东西方许可证治理的两种核心范式,暗示跨文化共鸣下的制度性差异。

这场持续约两年的制度实验,在东亚贸易史上刻下双重烙印。一方面,其“凭证管控—双向稽核—限时回销”的三重架构,标志着遣明使开展的私人贸易向规范化管理的转型尝试,彰显地方政权对贸易流程的强力介入;另一方面,信票失效后难以抑制的走私网络反成嘉靖朝大倭患的温床,折射出明朝在海禁与开港间的困境。这场仓促而精致的制度革新,终成朝贡体系崩溃前夕最后一抹理性的微光,其认证逻辑竟穿越时空,在五百年后的全球供应链管制体系中找到遥远回响。

三、冷战与 COCOM: 多边遏制中的许可证博弈(1950—1994 年)

1950 年,由美国主导的巴黎统筹委员会(COCOM)的成立,标志着冷战技术遏制的多边化转型。COCOM 的核心使命是通过许可证制度阻断战略物资流向社会主义阵营,其管控清单分为三级:Ⅰ类(武器与核材料,绝对禁运)、Ⅱ类(数量管制物资)、Ⅲ类(监视项目)。这一架构试图将贸易武器化,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推动联合国通过对华全面禁运决议,并于 1952 年在 COCOM 下设“中国委员会”(CHINCOM),制定

① 参考来源于日本国立公文馆藏的许孚远《敬和堂集》,明万历二十二年刊本。

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黄坤,严佐之,刘永翔.顾炎武全集:第 16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092.

共计 295 种物资的贸易禁运清单,涵盖机床、精密仪器、运输设备等基础工业品类。中国委员会的贸易管制水平明显比 COCOM 对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管制更严,中国贸易禁运清单的严苛性凸显出对地缘政治的特殊针对^①。这种“小院高墙”策略旨在扼杀新中国工业化萌芽,却意外催化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技术协作。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通过贸易和使用苏联政府贷款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 156 项重点建设项目的成套设备和技术,建设了一批钢铁、电力、煤炭、石油、机械、化工、建材等骨干企业,为中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基础。在这一阶段,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 1951 年为 52.9%,1952 年至 20 世纪 50 年代末,都在 70% 以上,其中对苏联的贸易额约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50%^②。

许可证博弈的经典崩溃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东芝机械公司向苏联出口 9 轴数控机床时,通过三重规避策略突破 COCOM 封锁:(1) 将受控机床申报为“二轴机床”,利用 COCOM 清单更新滞后漏洞;(2) 在填报出口对象国时,以挪威国营军事工业企业康斯伯格公司的名义提出申请;(3) 日本通产省基于虚假文件签发出口许可证,海关未开箱查验。此次交易使苏联潜艇推进器工艺跨越代际,彰显出 COCOM 的局限性^③。

COCOM 终结的核心原因是冷战格局的根本性崩塌。该机构于 1950 年成立后,以东西方意识形态对峙为基石,通过多边协调限制战略物资与高技术流向社会主义阵营,但冷战后期已显露制度疲态——其成员国经济利益分歧加剧,企业违规转移技术的案例频发,叠加全球化背景下技术扩散的客观趋势,其管制效能持续弱化。1991 年苏联解体与华约解散,使 COCOM 存在的核心前提(针对“意识形态对手”的管制共识)彻底消失。1993 年 11 月,成员国达成解散共识,1994 年 3 月 31 日,COCOM 正式终止运作。作为替代,COCOM 成员国于 1996 年签署《瓦森纳协定》,摒弃冷战式全面禁运逻辑,转向聚焦常规武器与两用技术的非扩散管控,以“国家自主裁量”为原则延续多边协调框架,标志着全球出口管制体系从“阵营对抗”向“非扩散合作”的转型^④。

COCOM 的兴衰揭示了多边出口管制的三重悖论。其一,安全与利益的冲突,盟国对华贸易额在禁运期间仍达年均 2.7 亿美元,荷兰飞利浦公司甚至通过香港转口医疗设备;其二,创新反制封锁,苏联在半导体禁运下发展出独特的电子管微型化技术,中国“两弹一星”核心材料均为本土研发;其三,人才流动的不可控性,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技术人才,催生了中国第一代数控系统企业,恰如今日中芯国际在先进工艺上的持续努力。苏联在禁运下发展电子管微型化、中国自主研发“两弹一星”,则构成冷战“压制—反制”的另一极,这种“霸权封锁催生替代创新”的逻辑,既延续了明代信票失效难以抑制走私网络的历史,也预示了当代芯片管制激发开源生态的走向。

① 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M].北京:中华书局,2005:305-306.

② 刘旭.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与对策[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1.

③ 崔丕.冷战转型期的美日关系——对东芝事件的历史考察[J].世界历史,2010(6):44-56.

④ 同①:525-526.

四、芯片法案与数字封锁:算法霸权下的许可证迭代(2018年至今)

当美国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时,技术许可证制度已悄然完成从物理禁运到数字霸权的范式跃迁。这场芯片战的本质是算法认证体系的全球重构——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2022年)构建三级封锁体系。首先是硬件层面,该法案提供527亿美元补贴,吸引台积电等半导体企业在美国建厂,试图限制中国获取先进制程技术;其次是软件层面,该法案通过出口管制措施限制高性能计算芯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试图阻止中国获取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第三是生态层面,英伟达通过CUDA平台^①吸引了全球大量开发者,形成了强大的技术生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球高性能计算和人工智能的发展^②。美国通过多种手段构建了多层次的技术封锁体系,其演进逻辑类似于明代信票制度从纸质凭证到稽核体系的升级,但当代的技术封锁更多依赖于法律和政策手段。

硬件封锁的矛头最先指向了制造环节。2020年12月,美国商务部将中芯国际列入实体清单,对10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实施严格出口管制,旨在限制其获取美国关键技术。受制于EUV光刻机获取管控,中芯国际转向DUV多重曝光技术路线,开发出N+1/N+2工艺(N+1对应7纳米级),实现了先进制程的技术突破。在美国2022年施压荷兰限制EUV光刻机出口后的背景下,华为于2025年第一季度推出昇腾910C人工智能芯片,成为突破封锁的重要标志性成果。该芯片采用华为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架构,由中芯国际通过替代技术路径实现量产——在无法获取国际最先进制造设备的情况下,中芯国际依托现有设备改良工艺,达成等效先进制程的制造能力^③。物理封锁的反噬印证了历史规律,正如明代禁海令催生双屿走私网络,技术压制终将激发替代创新。

而软件层面的博弈更具颠覆性。2025年1月13日,美国推出《人工智能扩散出口管制框架》(*Export Control Framework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ffusion*),将闭源大模型权重等虚拟技术参数列为管制物项,这标志着认证对象从实体芯片转向虚拟参数(5月13日被特朗普政府宣布撤销)。微软Azure对华限制高级别芯片云服务,A100实例供应大幅缩减,但开源模型(如中国DeepSeek-R1)未受影响,知识共享的基石仍在。DeepSeek通过混合专家模型(MoE)、群体相对策略优化(GRPO)、多头隐式注意力(MLA)等创新技术,仅以传统大模型5%~10%的成本实现了与GPT-4o等闭源模型相当的性能,挑战了依赖规模化资源投入的AI发展范式。DeepSeek的开源战略与去中心化模式降低了行业门槛,推动了全球技术协作与分布式智能生态的构建^④。

① CUDA(Compute Unified Device Architecture)是英伟达公司推出的GPU通用并行计算平台与编程架构,为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训练、推理及高性能并行运算提供底层软件支撑,目前为闭源专有技术。

② 史九领,洪永森,刘颖.美国《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对我国相关产业的影响与对策[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4(2):379-387.

③ 张一诺.面向卡脖子技术突破的中芯国际财务战略研究[D].武汉:武汉纺织大学,2022.

④ 蔡天琪,蔡恒进.DeepSeek的技术创新与生成式AI的能力上限[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136-143.

最隐蔽的枷锁在于技术标准认证权。美国通过出口许可审查强化芯片供应链控制,要求 2020 年后出口的芯片满足特定安全规范。这种将贸易产品与技术标准绑定的操作,使得认证手段异化为控制工具,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受到严重侵蚀。中国通过 WTO 争端解决机制等多边渠道,直指美国出口管制措施违背国际规则,推动全球贸易治理回归规则轨道,并在 WTO 起诉指控美国对先进计算半导体芯片、超级计算机项目、半导体制造产品及相关技术和服务实施的出口管制措施违反 WTO 规则^①。

历史的回响总在技术断层处激荡。明朝的魏一恭在利用信票调控对日贸易时,不会想到五百年后芯片管制的困境——真正的技术突围,在于将封锁压力转化为算力约束下的创新范式。今日美国竭力守护的 CUDA 生态,或将成为未来某场横跨太平洋的算力革命的催化剂。

五、比较视野下的治理范式变迁:共同逻辑、结构化差异与东西文明互动

纵观五百年贸易危机中的许可证治理演进,明代信票(1547—1550 年)、冷战 COCOM 体系(1950—1994 年)与当代芯片管制(2018 年至今)虽分属不同时代,却共同围绕“国家以认证权力应对贸易危机”的核心命题展开,同时因时代语境、文明根基与权力结构差异形成显著分野,而东西方治理范式的互动更揭示出制度演进的深层动力。

三大体系共享“危机—认证—反制—迭代”的本质逻辑,构成制度韧性演进的统一内核。从危机应对看,它们均为国家对双重危机的适应性回应。明代信票针对“朝贡崩坏与倭患走私”,COCOM 直面“冷战对峙与阵营竞争”,芯片管制聚焦“技术缩差与霸权维护”,均以认证工具弥合秩序裂痕。从认证权力运作看,它们均通过“载体—闭环—惩戒”机制落地。信票以“纸质凭证和双向稽核”为核心,COCOM 依托“商品编码和多边核查”,芯片管制依赖“算法筛查和数字追踪”,且均以国家强制力保障执行。

三者的结构化差异凸显了治理范式的代际跃迁,若从“危机性质、权力主体与结构、认证技术与载体、治理目标、制度韧性来源”五个核心维度进行解构,三者呈现出清晰的结构化差异,彰显治理范式的历史演进轨迹(见表 1):

表 1 治理范式的多维度比较

维度	信票制度(1547—1550 年)	COCOM 体系(1950—1994 年)	芯片管制(2018 年至今)
危机性质	朝贡体系内的“秩序失序危机”	跨阵营的“意识形态对抗危机”	全球霸权下的“技术代际危机”
权力主体与结构	地方政权主导(浙江海道副使),单中心集权模式	多边联盟共治(17 国联合决策),多中心协调模式	单边霸权主导(美国国会/商务部),层级化霸权模式
认证技术与载体	人工核验+纸质凭证(信票+号簿),低技术依赖	清单分类+行政审批(COCOM 编码),中技术依赖	算法筛查+数字载体(ECCN+区块链),高技术依赖
治理目标	维护朝贡伦理,实现“有序贸易”	阻断技术流动,保障“阵营安全”	垄断技术代差,巩固“数字霸权”
制度韧性来源	依赖地方官员权威,人治色彩浓厚	依赖盟国利益捆绑,规则共识薄弱	依赖技术标准垄断,生态绑定紧密

^① 商务部新闻办公室.商务部条法司负责人就中国在世贸组织起诉美滥用出口管制措施限制芯片等产品贸易答记者问[EB/OL].(2022-12-14)[2026-04-23].https://perth.mofcom.gov.cn/jmxw/art/2022/art_9a48b046827d46f6bca7276c9bcaa078.html.

东西方治理范式的文明根基与互动丰富了比较维度。明代信票代表东方“秩序包容型”范式,源于儒家“天下秩序”观,核心是通过认证将私人贸易纳入朝贡框架,实现“以序驭商”的内源性秩序重构;西方则形成“霸权排他型”范式,这源于殖民零和逻辑与安全至上原则,从葡萄牙船牌制的武力垄断,到 COCOM 的阵营封锁,再到芯片管制的技术霸权,均以外源性压制保障自身优势。二者并非孤立发展,16 世纪双屿港的葡萄牙商人或借鉴信票“凭证+稽核”机制,形成跨文明制度共鸣;冷战后 COCOM 封锁催化中国“三线建设”自主创新,当代芯片管制推动中国从“技术引进”转向“生态自主”,而中国探索的“底线管控+制度型开放”模式,融合东方包容特质与西方技术管控优势,为全球贸易治理提供了新路径。

五百年治理范式变迁表明,认证技术从人工稽核到算法筛查,权力范围从区域到全球的扩张,未改变“安全与自由、单边与多边”的核心矛盾。明代信票因过度人治、COCOM 因利益分化、芯片管制因霸权排他而遭遇困境,恰说明可持续的贸易治理需在压制与包容间找到平衡——这既是历史镜鉴,也是当代制度创新的方向。

六、认证、权力与反制——许可证治理五百年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历史镜鉴

纵观从明代信票、冷战 COCOM 到当代芯片出口管制的五百年历程,许可证作为国家应对贸易危机的治理工具,其演进并非简单的技术迭代,而是一场围绕认证权力的永恒博弈。通过深入比较三者,可发现其演进逻辑:认证技术从“人工稽核”走向“算法筛查”,权力主体从“地方政权”扩展至“全球霸权”。但同时,这种逻辑的核心始终是国家通过认证行为,在危机中重新定义“谁可以贸易”以及“何物可以流通”的根本权力。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每一次认证权力的强化,都同步催生了相应的反制创新,这便构成了一部“控制与突围”的辩证史。这一制度的变迁轨迹,既折射出不同历史阶段东西方贸易危机的本质差异,更清晰地呈现“许可证治理”的纵向内涵变迁与制度嵌入性特征:16 世纪信票嵌入朝贡伦理(秩序维护型),20 世纪 COCOM 嵌入意识形态(阵营对抗型),21 世纪芯片管制嵌入技术霸权(垄断压制型)。这种嵌入性差异虽分属于不同历史时期,却未改变“国家认证应对贸易危机”的核心逻辑,这也正是五百年比较的价值所在。任何许可证制度是否具有生命力,终究取决于其能否在安全与自由、单边与多边间找到平衡。

明代信票制度的兴衰为当代提供了深刻镜鉴,过度依赖单一行政权威、缺乏多元协同的“制度孤岛”,即便在特定危机中形成局部秩序,也终将因适应性不足而难以为继。这一教训在数字时代尤为凸显,当技术封锁呈现出“算法霸权”与“阵营化”特征时,RISC-V 联盟等跨域协作模式的兴起,恰是对“制度孤岛”困境的现实回应,印证了开放协同对于突破治理僵局的关键意义。

基于五百年比较视野,我们可提炼出“韧性许可证”的治理原则。其一,底线管控是前提,需以明确的安全阈值守护国家核心利益,从明代的“防奸商”到当代的“破解科技卡脖子”,这一内核始终未变。其二,技术中性是关键,应将技术工具定位于提升治理效能而非强化壁垒,区块链溯源与 AI 风险预测的应用,需服务于更公平的贸易秩序而非单边优势。其三,多边协同是方向,冷战时期“巴统漏洞”与当代数字封锁的反噬

效应共同表明,唯有基于规则的多边协商,才能构建可持续的贸易认证体系。

当前,中国探索的“底线管控+制度型开放”模式,正是对上述历史经验的创造性转化:既以“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工具筑牢安全防线,又通过自贸试验区、进博会等平台拓展制度型开放的边界,在坚守核心利益的同时,为全球贸易危机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解决方案。这一实践路径表明,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贸易秩序重构,韧性许可证的构建不仅需要技术升级,更需要治理理念的革新——以制度弹性应对危机不确定性,以开放姿态凝聚多边共识,方能在历史的长周期中实现贸易治理的可持续演进。

(责任编辑:刘雨轩)

Japanese Piracy, Cold War and Digital Blockade: a Five-Hundred-Year Evolution and Comparison of License Governance in the East-West Trade Crises

Wang Tantan¹, Ge Jiyong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133;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global trade is one of crises and governance. When trading activities are faced with crises, licensing systems become the core tool for state intervention in the market. By examining the three paradigmatic cases spanning five centuries—the Ming Dynasty’s Xinpiao (trade permit) system addressing Japanese piracy and trade disorder in the 16th century, the COCOM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to Communist Countries) technical embargo licensing during the 20th-century Cold War, and the contemporary U.S. semiconductor export controls, this study finds that trade licensing systems embody an inherent core logic of crisis response, power projection and efficacy contestation. Xinpiao pioneered the “trade with permit + time-limited permission” paradigm; COCOM transformed licenses into tools for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 digital-age licenses embed themselves into the global supply chains through technological means. A comparison of these three systems not only trac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but also dissects such deep-seated contradictions as the tension between sovereign authority and market autonomy, and the clash between technological control and innovative counter-measures, offering historical insights for institutional choices amid the current global trade frictions.

Key words: license governance; Xinpiao system; COCOM; chip export controls;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